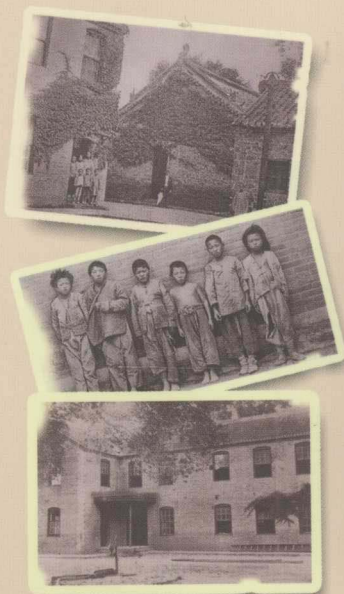




登州文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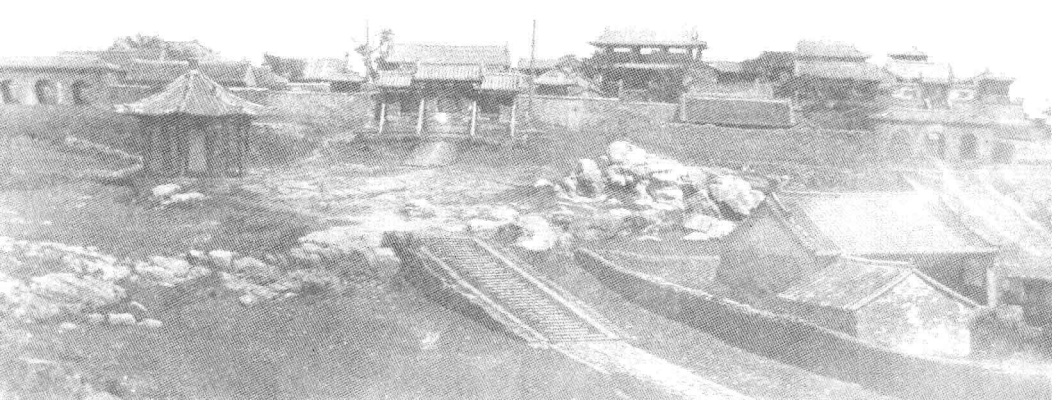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郭大松 杜学霞 编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登州文会馆

郭大松 杜学霭
编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郭大松,杜学霞编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209-06825-3

I. ①中… II. ①郭…②杜… III. ①教会学校—高等学校—史料—蓬莱市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6524 号

责任编辑:马 洁

封面设计:张 晋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

郭大松 杜学霞 编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32 开(148mm×210mm)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825-3

定 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登州文会馆研究会出品

前言

关于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5月《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新闻杂志《民生周刊》上发表题为《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文章,似乎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文章列举说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都有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资格,但同时指出由于“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认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的前身——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断言“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而“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文章最后指出:各高等学校为了自己学校的荣誉或地位,争相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去“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远不如“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①

对于《民生周刊》上这篇文章最后的观点,我们深表赞同:今天的大学,确实应该把精气神投入到真正大学教育中来。但尽可能追求真实,却是历史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报刊或网络上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学校,远不止《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一文所列举的这么几所。该文作者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

^① 《民生周刊》2012年第21期。



师大学堂”两所学校,显然是把上海圣约翰大学排除在外了。查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时间,无疑早于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长期以来很多人习惯于认为该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创始于1879年,“1892年始设大学课程,1895年第一班三人毕业”,1906年,“大学课程始定为四年”,同年“在美京立案,为圣约翰大学”。^①

很显然,“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笼统地说“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大学,难以全面准确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因为圣约翰大学是来华传教士办的大学,就不承认其创办时间比北洋大学早。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许多多现代新事物,大都来自西方。属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大学,自然也不例外。

传教士作为西方来华势力,与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扩张紧密相关。资本扩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直至今日,无论什么人欢迎与否,都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降,资本即开启了其全球性扩张的新时代。人类社会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

资本扩张与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密不可分,但很明显又不是一回事。通过平等协商、各取所需达成的资本扩张,为和平互利性扩张,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文明进步;以武力胁迫单方

① [美]卜舛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载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4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面进行的扩张,为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在扩大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也给人类尤其是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所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资本的和平互利性扩张,则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持欢迎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扩张大潮中来。

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历史上,中国门户洞开,国家主权开始不断地沦入外人之手,这事实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强力侵略性扩张和清政府昧于时势、措置失当双重原因造成的历史结果。传教士尾随坚船利炮而来,受不平等条约保护,与西方列强侵华自然脱不了干系。但传教士本身又不能说就是侵略者,他们不是受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为他们心目中的信仰服务,受所谓“神召”到异教国度拯救上帝子民,引导普天下人“归主”的。这些人在华开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都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服务的。况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许多多的教会大中小学也都按照规定在中国中央政府立了案。因此,作为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对传教士开办的现代大学置之不理。

然而,圣约翰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虽然建立时间比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北洋大学早,却也不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实实在在地是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创建的登州文会馆。曾担任登州文会馆第三任馆主、广文学堂(山东基督教大学文理学院)第一任监督的柏尔根(Paul D. Bergen),在《序登州文会馆志》一文中明确指出:“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①作为来华传教士,他应该了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敢于果断断言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自然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①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绪言,广文学堂印刷所民国二年刊行。

登州文会馆的前身为登州蒙养学堂(Te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创办于1864年秋,其时距创办人狄考文夫妇来华仅半年的时间。最初学制六年,1873年初将学制改为12年,学校更名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877年1月,学校又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同时隆重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后来由文会馆逐渐扩充发展而来的齐鲁大学的学生,因此而将这届毕业生视为第一届校友。

1879年(光绪五年),狄考文夫妇来山东15年后,第一次回国休假。休假期间,狄考文到各大学进修,广泛搜集各种实验设备、募捐,为建设真正高水准的大学做准备。“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长老会山东差会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20年的登州文会馆更名为“山东书院”(The College of Shantung)^①。1882年(光绪八年),根据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人们开始公认“狄考文创办的登州学堂为大学”,因为这所学堂此前已经做了多年的大学工作^②。1884年(光绪十年),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本部“授权”(authorized)登州文会馆办大学^③,英文名称“Tengchow College”,亦称“Shantung College”,中文名称一仍其旧。

1904年,根据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等新教差会的合作计划,文会馆正式迁移到位于鲁中且在新建胶济铁路线上交通十分便利的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开办的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中的大学班合并,更名广文学堂,山东基督教大学正式开办。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 207.

②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Second Edition, 1861-1913, p. 83.

③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 128; *the Annual Register and Report of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Shantung, China, 1915*, Issued by the University Council, p. 1.



山东基督教大学最初中文名称为“合会学局”，英文名称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山东基督新教大学)^①，直至1909年，英国圣公会加入到联合办学行列，始改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英文改称“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②。关于这段历史，以往除了山东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徐保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非民族情景”与民族主义诉求——以齐鲁大学为个案(1864~1937)》中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外，大都语焉不详，甚至多有不实之处。

顾名思义，“合会学局”意即美国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两个教会组织联合开办的学校。毫无疑义，这所学校以登州文会馆为主体。计划中的神道学堂当时是由原郭罗培真书院改造而成；医道学堂，此时则尚未建成。最初的山东基督教大学，正规地说起来，只有设在潍县以登州文会馆为主体的广文学堂。

至于“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实自京师大学堂始；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之说，前者对于京师大学堂的身份和地位而言，其实毫无意义。历史、全面地看，并非是名为“大学堂”才是真正的大学，一种新事物刚出现时总是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旧痕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都以“馆”、“书院”的旧名称命名，像“京师同文馆”、上海和广东的“广方言馆”、上海的“圣约翰书院”等。而学院、大学，乃至“馆”(实际是“学馆”的简称，就像今天的“某某大学”，实际上是“某某大学校”的简称一样)只不过是反映某些时代和社会特点的名号，并不说明学校的资质。今天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谁也没有因为其没有冠以大学的名号而怀疑过它的资质。而后者，与历史事实相去就太远了。登州文会馆早在1881年，就“分了专业，已经按照大学

① *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 Print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issions, 1907, p. 6-7.

②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Print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issions, 1910, p. 7-8.

正规课程组织进行教学”^①。广文学堂时期,由于是文会馆的班底,一开始就分五个系,分别是:宗教教育系(Department of Religious Instruction)、中国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自然科学系(Department of the Natural Science)、数学科学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哲学与历史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另外附设理化实验室(Physical and Chemical Laboratory)和天文观测台(Astronomical Observatory)。^②

事实很清楚,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登州文会馆才是中国土地上的地地道道的第一所现代大学。

美国学者小海亚特(Irwin T. Hyatt, Jr.)研究认为,登州文会馆“几乎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③。事实上,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直至20世纪初年也还是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大学。早在登州时期,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就有多名在长期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所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教书^④，“档案记录表明”，1894年，登州文会馆47名学完全部课程的毕业生，即“有11名在登州文会馆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担任教习”。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确定一次性聘任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担任教习，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

① *Catalogue of T'engchow College,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p. 9.

② *Shantung Union College, A College and an Empire*, 1906, p. 10 ~ 11.

③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ies Missionaries in the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40.

④ *Catalogue of T'engchow College,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p. 1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同学齿录卷四,广文学堂印刷所民国二年刊行。

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① 1902 年京师大学堂整顿重新开办以后,也一直有多名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教师。反过来看,登州文会馆无论是登州时期还是潍县广文学堂初期,却至今没有发现一名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抑或其他中国境内大学的毕业生担任教师。这一现象足以证明登州文会馆是那时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大学。

作为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好的大学登州文会馆的主要创办人狄考文博士,享有“大著作家”、“大教育家”、“大制造家”、“科学家、发明家”的美誉^②。他在妻子狄邦就烈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力支持帮助下,将西方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地移植到古老的东方天朝“人间仙境”登州,沐浴正直、质朴、宽容、理性民风,终于培育出了结满兼融东西方文明之果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清末民初山东乃至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清末推行教育改革时,文会馆师生仿照文会馆模式、规章,创办了中国省级第一所高等学堂——山东大学堂,清廷闻讯,通令各省“仿照举办,毋许宕延”^③。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④。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好的现代大学,却长期被埋没。出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考虑,我们选取了登州文会馆早期的可靠中外文文献,编译了这本资料集。

①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 - 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 - 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 61 - 62. 按:这一说法是狄考文在京师大学堂筹建时的说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最终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有据可查者为 8 人,其余 4 人无从证实,有待进一步发掘新史料深入探究。但即使 8 人任教京师大学堂,也无碍登州文会馆不仅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这一结论。

②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传记卷一·狄先生传,广文学堂印刷所民国二年刊行。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总第 4784 页。

④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传记卷一·狄先生传。按:这里的毕业生人数,应包括迁移至潍县后在广文学堂毕业的学生。

《登郡文会馆要览》原文为英文,《登郡文会馆典章》为中文,很可能是由于篇幅过短,两份文献装订成一本小册子,看上去像是一份文献。但若仔细读下来,虽然两份文献中有些内容相似甚至可以认为完全相同,可实际上还是两份不同的文献,有各自的页码编排。更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有介绍文会馆创办发展历程的“历史概要”、文会馆开设课程的“学习课程说明”,而后者没有;即使本应完全相同的课程安排,前者按英文翻译出来的课程是现代名称,可以使今天的读者对文会馆课程有更清楚的了解。

《文会馆志》是全面介绍文会馆早期历史的文献,虽然简短了些,但却几乎是面面俱到,从中可窥文会馆全貌。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这三份文献资料流传甚少,给很多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近些年来,本省以及包括北京、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向我们索取这些文献的专家学者特别是研究生,为数可观。现在我们将三份文献编辑成册,把其中英文部分译录为现代汉语,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注释;中文部分为方便青年学者检阅,做了点校,文中的错、漏、别字,以【】形式补正。

登州文会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规模不大,但却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且招生、授课模式、学生管理等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涉及自然科学史的内容,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者所能一目了然的。同时,文会馆开设与中国当时科举制度下学子读书内容完全一致的传统课程,早期将文理、中西甚至工科和医科统统融为一炉,毕业生毕业后各有所长。相对于今天分科越来越细,不同学科出身的学子隔行如隔山,难以甚或根本不可能融通的局面,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会馆研究,需要今天历史学以外的更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以期我们的研究不单纯地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更能够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某些历史镜鉴,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蓬勃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编译者囿于学识,在翻译、点校、注释中,

缺点和错讹恐难以避免,敬祈方家教正。

本书受大众报业集团资助出版,特此表示衷心谢意。

编译者

2012年6月于蓬莱



目 录

前 言 | 1

一、登郡文会馆要览 | 1

二、登郡文会馆典章 | 23

三、文会馆志 | 39

附 录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登州文会馆历史回眸 | 195

后 记 | 276

CATALOGUE
OF
TÊNGCHOW COLLEGE,
CHINA.

* ✕ *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教 员^①

神学博士、法学博士狄考文牧师 (Rev. C. W. MATEER, D.
D., LL. D.)

赫士牧师 (Rev. W. M. HAYES)

顾牧师 (Rev. S. B. GROVES)

狄考文牧师夫人 (MRS. C. W. MATEER, 中文名字狄就列,
又作狄就烈、狄邦就烈)

赫士夫人 (MRS. W. M. HAYES, 中文名字赫美吉)

富济克牧师夫人 (MRS. E. G. RITCHIE, 中文名字富知弥)

顾牧师夫人 (MRS. S. B. GROVES)

于锡晋 (YÜSHI CHIN)

李芮芳 (LI PING FANG)

张丰年 (CHANG FÊNG NIEN)

朱葆琛 (CHÜ PAO CH' IN)

袁曰俊 (YÜAN YÜE CHIN)

学 习 课 程

第一年

经典:念《书经》(三、四册);

念诗文(各一本);

讲《诗经》;

讲评《论语》。

① 这份英文教习表,比《登郡文会馆典章》开列的教习多两人。多出的两人为顾牧师 (Rev. S. B. Groves) 和顾牧师夫人 (Mrs. S. B. Groves)。查这两人事实上 1891 年刚刚奉派来登州文会馆教学,尚未正式开始教学工作。《登郡文会馆典章》未列入,很可能即是这一原因。

作文:作文章(每周一篇);作四韵诗^①。

数学:代数(*Mateer*)^②。

宗教:念《天道溯源》前半部(*Martin*)^③。

第二年

经典:念《礼记》(一、二册);

念诗文(各一本);

讲《书经》;

讲评《孟子》。

作文:作文章(每周一篇);作六韵诗^④。

数学:几何(*Mateer*)^⑤;圆锥曲线(*Judson*)^⑥。

历史:《万国通鉴》(*Sheffield*)^⑦。

宗教:《天路历程》。

① “四韵诗”,简称“四韵”。四韵八句,即近体诗中的五言、七言律诗。

② 在这份英文课程表中,一般斜体人名(姓氏)都表示该课程教材的作者。这里的 *Mateer* 即狄考文,意为代数学教材的作者是狄考文。查狄考文有《代数备旨》一书,但现在能见到的基本都是很晚的版本,大多最早的是1908年的第二版。这里以这种形式标明,则说明《代数备旨》一书,作为教科书已经出版了。据《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记载,《代数备旨》一书早在1882年之前即已经完稿,第一版约在1886年前后正式出版。参见: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 164.

③ *Martin*, 即丁韪良,著名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与狄考文交往甚密,夏季常来登州狄考文家避暑。早在宁波传教时,丁韪良即著有《天道溯源》一书。

④ 律诗的一种,多为五言,六韵十二句。科举时代特指试帖诗。由此可见,登州文会馆的文科及当时的中国传统教育课程分量不轻。

⑤ 狄考文。狄考文几何学著作有《形学备旨》一书,最初版本为1885年上海美华书馆版。参见: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 163-164.

⑥ 贾德森,国籍及职业不详。从这份英文课表的有关规则看,贾德森的《圆锥曲线》应是中文且已经出版的教科书。

⑦ 谢卫楼,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69年来华,与人合作译著世界历史著作《万国通鉴》。

